



张灿辉
著

六朝区域史研究



岳麓書社



六朝区域史研究

张灿辉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区域史研究/张灿辉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6

ISBN 978 - 7 - 80665 - 758 - 4

I. 六... II. 张... III. 江南(历史地名)—地方史—
研究—六朝时代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273 号

六朝区域史研究

作 者:张灿辉

责任编辑:马美著

特邀编辑:彭 霞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9. 2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 7 - 80665 - 758 - 4/C · 617

定价:20. 00 元

承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前 言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问世,将六朝区域政治史与家族社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为理性的时代;二十余年来,许多史学新秀纷纷从中引发灵感,写出了不少具有影响的论著,从而使区域史及家族社会史研究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颇具吸引力的课题。

以皇权政治兴替为核心来探讨区域政治势力或集团之演生,不失为区域政治史研究中的主要特色,就六朝区域政治史而言,江东豪族集团、河南“侨姓”势力、南徐北府集团、青齐豪帅集团、荆雍集团与南川豪酋势力相继成为六代皇权政治兴替沉浮的支柱性力量,史家对这些集团或势力的深入探讨自然有着非同凡响的政治意义,或者说更能说明政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

就整个中古史而论,区域政治势力酝酿与成熟的最佳时段应该是在春秋战国至隋唐间的千余载的历史长河中,此前之商周时期,因原始氏族制残余与宗法等级制的滥觞,区域政治格局基本上是依赖于血缘宗法关系,或者说是森严的等级序列阻隔了区域政治势力的正常演生。然而,自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权力下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得统治的地位,便要在经济上埋葬奴隶社会赖以生存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政治上则力图冲破传统等级制度的束缚,摧毁世官世禄制度;而在文化上,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学术文化下移,思想解放,适应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走向成熟的思想文化运动(即“百家争鸣”)便成为春秋战国间的一幕历史大活剧。正是在这一历史大活剧之下,便萌生出了地域势力这一新兴的政治力量,也正是这一力量的不断推演才缔造了两汉六朝间区域势



力发展的鼎盛时代。

在中国上古社会,区域间的对抗与冲突因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形成了简易的地理方位解读,夏、商、周政权的更替表现出明显的东西对抗,而至秦汉间,区域势力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地理方位性,并由此而形成东南与西北之政治对抗,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段材料包含了重大的政治含义。在这里,司马迁似乎总结出了自夏朝至西汉政权建立近两千年间之皇权政治的演变轨迹,而这一轨迹在历史发展空间的运行模式是由东南向西北移动,随着这一空间的移动,王朝政治亦由酝酿而走向兴盛和成熟,实际上也可以说中国夏、商、周之三代政治与经春秋战国社会动乱之后兴起的秦、西汉两代封建王朝,他们的政治重心是在西北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个政治重心的坐标轴中,东南广大区域的政治运动都只能成为当时王朝政治运转的点缀品或附属物。更有趣味的是,凡是与主流政治势力相对抗而败北者,却又不断地从政治重心的西北地区向东南撤退。同时,也正是在秦汉间,社会上出现了“东南有天子气”的政治谣言,并因此而开启了后来六代区域政治运生之先河。六朝时代,辖域内表现出来的是长江上下游之争的格局,而在整体政权的发展上却因此而形成长达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在这一系列的对抗与冲突中,各区域势力的诞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对抗与冲突。

我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之发生与发展呈现出的是多极与多元的演变轨迹,区域集团或势力之运演亦不例外。就六朝区域历史而论,依违于皇权政治之紧密关系,自然是皖北、北府、淮泗、荆雍与南川诸种集团或势力显得十分重要。但若以历史发展之多极化、多元性观点来看,只要是属于王朝政治管辖之各区域,其政治势力之兴衰沉浮,均与中央政府(即皇权政治)发生非此即彼的联系,且这些联系的紧密与否大多取决于皇权政治的发展导向。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

到,过多地依违于皇权政治惠顾的各区域政治军事势力,其兴衰沉浮亦有着急风暴雨般的运转轨迹,因为六朝时代之皇权政治从来是不太稳固的。况且,在新兴的皇权政治确立之后,面对的是辖域比原来地域势力所控制的要大得多,加上这一时期的膏腴士族执掌社会上的一切,新兴的皇权政治自然要依违于士族之向背而行使自己有限的皇权,由此而使其不得不有意识地疏远甚至抛弃支持其荣登大宝的各区域势力,而在这一历史外因的互动下,支持皇权政治诞生的各地域势力本身的弱点亦急剧暴露无遗,迅速衰落则在所难免,关于此点,前贤之述备矣。

本书所论及的是六朝区域政治力量的变迁与进程,但并非六朝政权统治的所有区域,仅仅选取其中一些为人所忽略的相关区域,大致为长江中游之雍、郢、湘诸州之江州之豫章地区与岭南之交州与广州,这些区域之政治势力运演大多与其时的主流政治间并无多少直接的血肉关联,正因为无皇权政治的直接青睐,所以这些地区的政治演进历程相当漫长,其间并无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活剧上演。然而,在六朝时代,这些地区却在与时俱进,它们与其时的江南历史一样,在中原封建文明的沐浴之下,迅速走上了封建化与回归六朝主流政治历史的发展轨道,其间的区域政治势力亦在不断地惨淡积蓄自己的政治的、军事的或文化的历史热量,于六朝皇权政治的推演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历史角色。

20世纪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述及:“永嘉南渡之寒族北人既丧失其原来善战之能力,江东土族遂起而代其任。此南朝后期之将帅,其先世名字所以多不见于南朝前期政治及社会史之故也。陈书叁伍熊昙朗等传论(南史捌拾侯景熊昙朗等传论后段同)云:‘梁末之灾軫,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家,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盖此等豪酋皆非汉末魏晋宋齐梁以来之三



吴士族,而是江左土人,即魏伯起所谓巴蜀溪俚诸族。是等族类在此以前除少数例外,大抵为被压迫之下层民族,不得预闻南朝之大政及居社会高等地位者也。”研究六朝政治史的学者们,无不从此获取灵感,或辅之论证,或推演说明,拙亦不揣浅陋,兹陈老之论加以推演之,囫圇成文,望大家批评指正。

目 录

001 / 前 言

001 / 第一章 “东南天子气”之演生与江南政治格局的形成

001 / 一、前言

001 / 二、“东南天子气”的缘起

010 / 三、江南区域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016 / 四、结束语

018 / 第二章 雍州进程研究

018 / 一、前言

019 / 二、雍州势力崛起与刘宋政治

025 / 三、雍州势力的发展与萧齐政治

035 / 四、雍州势力的盛衰与梁代政治

044 / 五、河东解柳氏

051 / 六、结束语

052 / 第三章 郢州进程研究

052 / 一、前言

052 / 二、郢州之置与刘宋政治

058 / 三、郢州与萧齐政治

060 / 四、郢州与梁陈政治

064 / 五、结束语



065 / 第四章 湘州进程研究

065 / 一、前言

066 / 二、湘州与刘宋政治

075 / 三、湘州与萧齐政治

084 / 四、湘州与梁代政治

094 / 五、湘州与陈代政治

104 / 六、论巴陵

115 / 七、余论

125 / 第五章 豫章进程研究

125 / 一、前言

126 / 二、豫章与东吴政治

133 / 三、豫章与西晋政治

136 / 四、豫章与东晋政治

143 / 五、豫章与宋齐政治

157 / 六、豫章与梁代政治

166 / 七、豫章与陈代政治

173 / 八、结束语

176 / 第六章 交州进程研究

176 / 一、前言

179 / 二、交州与东吴政治

198 / 三、交州与西晋政治

204 / 四、交州与东晋政治

213 / 五、交州与宋齐政治

225 / 六、梁陈时代交州的历史走向

230 / 七、结束语

232 / 第七章 广州进程研究

232 / 一、前言

232 / 二、广州与东吴政治

235 / 三、广州与西晋政治

239 / 四、广州与东晋政治

248 / 五、广州与宋齐政治

260 / 六、广州与梁代政治

277 / 七、广州与陈代政治

286 / 八、结束语

第一章 “东南天子气”之演生与江南 区域政治格局的形成

一、前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构成中央政府之权力核心圈往往与一固定的地域集团或种族势力相结合,产生了诸种类似于地缘或族缘之政治学。这种政治构架之作用,不断地推演着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向前发展。也正是这种发展,中国之民族融合与各区域间之开发进入一个几乎同步运行的历史轨道。这似乎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帝王所标榜的“天恩浩荡,利益均沾”的治理模式,同时也使中国之政治体制由君主政体向专制政体形式延伸,并向近代民主共和政体演进。

二、“东南天子气”的缘起

《史记·六国年表》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段材料中所包含的相生相克的“五行学说”暂且不提,但其政治含义就不得不说了。在这里,司马迁似乎总结出了自文明社会开始之夏朝至渐进入封建社会之西汉政权的政治演生轨迹,这一轨迹在历史发展空间的运行模式是由东南向西北移动的。随着这一空间的移动,王朝政治亦由酝酿而走向兴盛和成熟。实际上也可以说中国夏、商、周之三代政治与经春秋战国社会动乱之后兴起的秦、西汉两个封建王朝,他们的政治重心是在西北之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个政治重心的坐标轴中,



东南广大区域的政治运动都只成为当时王朝政治运转的点缀品或附属物。更有趣味的是,凡是与主流政治势力相对抗而败北者,却又不断地从政治重心的西北地区向东南撤退。这一状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军事民主制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败北后的神农氏(即炎帝)及其后裔到底向何方迁徙?从后来的历史叙说中,似乎神农氏已迁移到了江南地区。炎帝如此,虞舜也是一样。“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虞舜在位三十九年之后,兴许是被新兴夏部族所逼,不得不率所部往东南地区撤退,因虞舜仍然为部落民主首领,故史家仍将这一撤退谓之“南巡狩”。与炎帝一样,最后在今天的湖南留下了炎帝陵、舜帝陵这笔可观的中国远祖文化资源。夏朝末年,商王成汤率军问鼎中原攻打夏国,夏桀兵败鸣条。据《逸周书·殷祝解》记载:“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汤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灭道残政,士民惑矣。吾为王明之。’士民复致于桀曰:‘以簿之居,济民之贱何?必君更!’桀与其属五百人徙千里,止于不齐。民往奔汤于中野。桀复请汤,言君之有也。汤曰:‘否。我为君王明之。’士民复重请之。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居南巢。”这段材料是对商汤放逐夏桀全过程的文学描述。案:关于南巢的地望,据《史记正义》云:“南巢,今庐州巢县是也。”可见,南巢是在中国之东南,即今安徽巢县西南一带。依此,则夏桀的放逐逃亡路线是从中原之中游地区逃向东南,最后于江淮地区之南巢找到了避难所。在西周历史的演进道路上,亦上演了另外一幕,据《史记·周

本纪》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至于“荆蛮”之地在何处？同卷注引《史记正义》云：“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因此，荆蛮之地实际上是指长江下游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太伯与虞仲虽然流落于江东之地，却推动了江东地区文明社会之历史进程，春秋五霸之吴越两国之开创史均溯源于此。

由此看来，在先秦时期，中国古老王朝政治的龙脉是在中原黄河流域，中国政治命运的主宰族群亦居住在这一区域；广大的江南地区虽对这一政治龙脉的形成起着排头兵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也只能成为这一传统政治格局的附属物。正是这一因素起作用，东南与中原间种族之抗争、文化之冲突，便成为周秦时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秦国崛起西陲之地，因商鞅变法之成功，借崤函之固，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六合，结束了长达五百余年之久的分裂与割据局面，再次用铁的事实印证了“西方物之成熟”之准确预见性。然而，历史的演进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东南与西北间地域政治格局的差异性却在因江南之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剧而变化着、发展着，并最终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势力格局，促使政治重心向江东地区移动，即王气东去也。

但天子气东去的历史进程并非肇始于秦的统一。早在分裂割据五百余载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周王式微，礼崩乐坏，自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诸侯并起，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出现，便表明了这一时期之政治主动脉的跳动并不局限于某一固定区域。如长期与齐、晋两大中原霸国相抗衡的楚国崛起于长江中游，“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



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①。但历史进入春秋以后，楚国之君无不称王；而此际之中原诸侯霸国，却仍然不敢僭越王者之称。

长江中游如此，而长江下游地区，随着春秋历史的演进，吴越二国几乎同时崛起，据《越绝书》载：范蠡与文种因见“霸兆出于东南”，“相与谋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邀）东游，入越而止”。案：越因会稽之败而屈从于吴，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用文种、范蠡等贤能之士，最后成为春秋霸国之一。

“及至秦王（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殳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②建立起秦帝国这一旷世基业。然而，这一帝国之基业并不能持久，传统的地域格局即东南与西北之对立加剧，这一点，秦始皇自己也觉察到了，据《汉书·高帝纪》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厭当之。”案：秦始皇一生的巡游经历，研究者颇多，都注意到了其间的地域性因素，这是很有可能的。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向东南巡游，“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南登琅邪，大乐之……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禘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

①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这一次巡游，秦始皇从西到东，从东到南，又从南而西，其间有关地域隔阂的材料只有秦始皇大怒湘山祠时“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一事。而“湘山祠”之地址却不是东南方，而是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区。但到三十七年，秦始皇的第七次巡游，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巡游又发生了地域之变化，“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①。这一次秦始皇吸取了上次在湘山祠的教训，故而行至云梦而未敢渡江；但即使如此，厄运还是有的，在长江下游地区，秦始皇渡浙江时，因“水波恶”，便只好“从狭中渡”。我们知道，秦始皇取战国之际兴起的“阴阳五行学说”，履水德而得天下，故尚水，改黄河为德水；可江南地区之水系却有点不听其使唤，屡次与之恶；而对这一可笑之处的合理解释就只有地区格局的差异了。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秦始皇的东南巡游包含的意义并非仅此，我认为，秦始皇巡游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东西文化的认同。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度同制，这一系列措施就在于消除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分裂割据，营造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环境。而在这一巨大环境工程中，秦始皇已经注意到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上引材料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名山大川往往与中国文明史进程有着诸种关联，对名山大川的祭祀也成为先秦时期君主政体行使其政治权力的重要表现。秦始皇建立空前之统一伟业，是以登泰山，至湘山祠，上会稽，望祭九疑，望于南海等等，均是在寻觅着传统的文化根基，在述说自己秉承先世余烈之理想；至于捞周鼎于泗水，则可视强化自己统一大业之举措，因为周鼎代表西周王权的强大，秦之历史赓续于西周，并以西北文化之代表自居，理应拥有此鼎；与齐鲁诸儒之议论，恐怕是试图在西北之法家文化与东方之儒家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契合点。我们知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道,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以前,对东方之儒家文化颇为陌生,是以儒学之士在秦国之权力中枢机构中并无地位,但统一(尤其是秦始皇东巡)之后,儒生纷纷入仕朝廷,并能与秦国原有显贵廷争面折,便充分显示出了秦始皇寻找文化认同之重大作用。由此看来,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巡游并非是为了厌“东南天子气”,而是为了实现统一帝国之文化认同;至于三十七年的最后巡游,秦始皇也不是将“东南天子气”提到议事日程上,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是“亡秦者胡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秦末之“东南天子气”的出现是一种东南地域间的政治谣言,是为了某一政治集团或地域势力进行的政治宣传,并非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兹就《汉书·高帝纪》的材料予以说明:汉高祖刘邦为沛县中阳里人,有着离奇的出生:“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不仅刘邦如此,连其父太公(一名刘执嘉)亦如此,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引《春秋握成图》云:“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案:刘邦之时代,中国之历史已进入文明社会两千多载了,不再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野蛮时代。汉史如此记载,似乎是为了掩饰某种缺陷,这种缺陷就是刘邦出身之卑微。而这种卑微的出身,在当时的等级社会里,若无机缘巧合是很难冲上云霄九的。为了更进一步地掩饰下去,《汉书·高帝纪》又罗列了以下神奇的叙说:刘邦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貰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酺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按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亭是秦朝地方行政机构中最基层的单位,亭长作为斗石之吏,主要负责(方圆十里)居民的治安和捕盗,而刘邦身为此职,好酒貰账,并以作怪之事而使商家“折券弃责(债)”,可见刘邦在地方上与地痞无异。又刘邦曾以亭长之小吏,监送刑徒至骊山,“徒多道亡”,刘邦也只得与徒中壮士十余人逃亡到丰县西边的泽中亭,“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后人

来至蛇所，有一老姬夜哭。人问姬何哭，姬曰：‘人杀吾子。’人曰：‘姬子何为见杀？’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姬……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前载刘邦乃交（蛟）龙之子，而龙为水中灵物，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龙与蛇本来就有着莫大的关联，秦尚水德，于荒郊野岭挥剑斩蛇本是很平常的事，而这里刘邦以“赤帝子”身份杀了“白帝子”，脱离了水德之阴影，附会了周秦之际的“三统说”，又一次渲染了这位横空出世的真命天子。在刘邦逃亡期间，再一次将刘邦这一赤帝子与天子联系起来，这就是关于“东南有天子气”之政治谣言。汉史是这样说的：“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刘邦字）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附天子紫气之说，这在中国古代开国帝王的史记中是多见的。但从刘邦离奇的出生、巧怪之事不断到挥剑斩白蛇、天子紫气附从等一系列怪异事件，更主要的是为了衬托一个地位卑微的真命天子。读《史记·陈涉世家》，“为人佣耕”的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起义之际，亦曾以“鱼腹置书”、“篝火”、“狐鸣”之类以鼓动民众，但与刘邦相比，却又显得十分原始，故而失败也就难免了。

中国东南之地名沿袭史中，有一些地名的由来似乎也与秦始皇之忌讳“东南天子气”一事相关。是否如此呢？兹引六朝时期相关方志的材料予以说明：

1.《水经·江水注》引吴张勃《吴地记》载：“谷中有城，故由卷县治也，即吴之柴辟亭，故就李乡樵李之地。秦始皇恶其势王，令囚徒十余万人，污其土表，以污恶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

2.《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正义引《徐州记》云：“秦使赭衣凿其地，因谓之丹徒。凿处今在故县西北六里。丹徒岷东南连亘，盘纡屈曲，有象龙形，故秦凿绝顶，阔百余步。又夹坑龙首，以毁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龙、目二湖，悉成田也。”

3.《北唐书钞》卷一五七“岗”条引宋刘损《京口记》称：“有龙目